



**集装箱船里的“小阿弟”**

40年前,绝大多数国人不知集装箱为何物。首航前,上海远洋公司先买来两个集装箱给员工启蒙,几天后竟被码头工人改造成厕所。

王再生回忆,上世纪50年代集装箱船出现,到1978年欧美不少国家已经有大型集装箱船。“好几次到国外港口,我都盯着老外的大集装箱船纳闷。那么大的船,那么多货,怎么一夜之间就能卸完?别人跟我们讲,集装箱船就是先进,装卸速度比我们传统的散杂货船快好几倍。”

终于,中国也有集装箱船了。每谈及于此,王再生都是百感交集。“我们起步很晚,但终究还是有了,而且我赶上了。”

箱是从国外买来的,船也是从国外买来的。即便如此,“平乡城”轮首航到达澳大利亚仍是一件扬眉吐气的喜事。“澳大利亚港口为我们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首航的船员们都特别骄傲。只是国外的集装箱船个头很大,我们很小,是‘小阿弟’。”

1978年的中国物资匮乏。“平乡城”轮从上海出发时货物不多,从悉尼回来时才有较多的重箱。

宋徽宗的退位发生在宣和七年,他仅四十余岁。当时,金兵兵锋逼近开封。宋徽宗欲南迁避乱,于是打算命皇太子开封建牧,留守东京。大臣李纲表示,巨敌猖獗,形势凶险,皇帝必须传位给太子,才能使太子有足够的权威、名正言顺的位号统领全局。李纲的提议与部分大臣取得了共识,这也成为宋徽宗决定内禅的关键原因。于是,徽宗“内禅,以道君君退居龙德宫”,没多久就仓皇南逃。

金兵围攻开封未果,于是撤军,旋即徽宗北归。可不久之后,金国再次侵宋,这次直接将徽、钦二帝虏走。

徽、钦二帝被虏走之后,徽宗第九子赵构即位,是为宋高宗。高宗单是内禅就搞了两次。他第一次宣布退位时年仅二十余岁,完全出于被迫。南宋将领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要求高宗逊位,传位给不到三岁的皇子赵昀。高宗无奈答应。大臣张浚联合吕颐浩、张浚、韩世忠等人整军勤王,苗傅、刘正彦迫于压力,又请赵构复位。

时隔三十多年后的绍兴三十二年,高宗再一次宣布退位,将皇帝位传给自己的养子,也就是后来的宋孝宗。这次是完全自愿的。高宗与当年的徽宗面临极其类似的境况,即金国南侵的威胁。宋高宗退位后,又当了二十几年太上皇,到八十一岁时才去世。他的去世,间接引发了又一次内禅:孝宗内禅。

高宗去世,孝宗非常悲伤,决定为养父守丧三年。孝宗一直志在“恢复”,而高宗喜好“议和”,加上

## 1978年中国第一艘集装箱船首航

1978年9月26日,中国第一艘集装箱船“平乡城”轮运载162个集装箱从上海启航,王再生是船上大副。尽管已做了多年船员,他也只在海外港口远远看到过人家的集装箱船卸货。如今80多岁的王再生再说自己“赶上了好时候”,跑了中国第一条集装箱远洋航线,后来成为船长。



图为“平乡城”轮

“我国当时和澳大利亚做生意,回程时集装箱里放的大多是上海港需要的机器、工业原料等生产物资,生活用品都很少。”

**买二手9英寸黑白电视回国**

远洋船员是辛苦又枯燥的职业。“平乡城”轮单程近一个月,每天面对的都是茫茫大海,打不了电话,收不到信件,工作之余,就是几十个船员你看我,我你看你。那时,船员最大的福利是每年可以按规定从国外购买一台电器。

唐阿婆是王再生的老伴儿,“我们家最早的家电都是老王从国外带回来的”。最早买过一个二手9英寸黑白电视机,用了不到半年就坏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船员们条件逐渐好了,不再买旧的“洋电器”。“第一件全新‘洋家电’是台21英寸彩色电视机,在我们小区是第

成长过程中的一些其他因素,孝宗潜意识里一直是对高宗有不认同和反抗情绪。潜意识中的对父亲的叛逆又带了“内有惭德”的感觉,这又导致孝宗对自己的自责,并以极端的方式要求自己居丧行孝,甚至内禅退位。

如果说孝宗内禅是因为对父亲过于“孝顺”,那么接下来的光宗内禅,可以说是因为他对父亲过于“不孝”。孝宗即位之后,作为儿子的光宗应该经常去看望父亲,但他在即位一段时间之后,就绝少看望父亲。更有甚者,在孝宗病重期间,光宗也拒绝侍疾。

孝宗虽然退位为太上皇,但他在光宗身上,过多地寄托了自己“更改”的政治理想,无形中给光宗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压力。最让他士大夫阶层无法接受的是,光宗竟然拒绝主持父亲的葬礼。皇帝不执父丧,将造成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果然宗室重臣赵汝愚联合外戚韩侂胄等人禀请太皇太后(宋高宗的皇后)垂帘听政,以太皇太后的名义命皇子即位,也就是迫使光宗内禅。

两宋战乱动荡,位号意味着责任,帝王承担着守卫家邦、保全社稷的重负。大敌来袭之际,他无法逃避,比布衣黔首更不自由。在险恶的时局里,帝王往往成为敌人的首要猎物。另外,国与国的对峙,主战与主和的纷争,“恢复”与议和之间的冲突,战争与和平的不同抉择,也造成了帝王家庭内部父子之间政治理想的分歧。

(摘自《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费志扬/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台,邻居们非常羡慕,每天晚上我会邀请邻里大小朋友来家看电视,最多的时候家里同时挤了20多个人一起看电视”。

之后,王再生又慢慢地从香港、日本等地给家中添置了空调、冰箱、录音机等家电。“我们家现在用的这台空调,就是王再生1991年从香港买来的呢。当时没舍得用,后来搬家才装上。”唐阿婆说。

那个年代的船员大多节省,偶尔船上会统一发些“洋食品”,比如饼干、巧克力,船员们多数不拆封一直留到下船,孝敬长辈或者给孩子尝“新鲜”。“我记得王再生跑远洋航线时,有时候还会买一些1米、2米裁剪好的彩色涤纶布料回来。当时在国内这些都是好东西,有什么亲戚朋友的孩子结婚,我们就送一块布料当贺礼,很有面子。”

## 陈嘉庚提议废除长袍马褂

早在20世纪初,孙中山在日本横滨的中国城,就向封建帝制“开了改革的第一枪”,即“尽易旧装”,不穿长袍马褂,以这种颇具仪式感的行为,与清王朝彻底决裂。

然而,在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8月,当时的参议院还发出通告:“长袍马褂为常礼服,但有公职者必须用西式礼服。女子礼服仍用旧式,惟除去挽袖周身得加,惟饰长与膝齐,不限颜色,裙仍用旧式,绣不得用红色。”国民政府在1929年公布的《服制条例》中,还正式将蓝长袍、黑马褂列为“国民礼服”。

对此,在上世纪20年代,陈嘉庚就曾多次批判,认为服饰应改改革,“表示维新气概”。

1937年1月1日,陈嘉庚发表《复兴民族与服制》一文,直言:“故吾人以为欲谋民族之复兴,一切改革必须力求其彻底……长袍马褂,定为礼服……窃期期以为不可也。”1937年2月1日,陈嘉庚又致电国民政府内政部,提议:“请废除袍褂,谓长衣马褂乃清服遗制,时宜既失,早应废除,今仍遵照礼服,实足影响民族心理,阻碍民族复兴。”这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当时的《申报》《万影》《儿童世界》等报刊均刊发了陈嘉庚的提议,“国内正部正从事修订条例(指1929年公布的《服制条例》)。”

陈嘉庚的提议得到了各界有

唐阿婆回忆。

远离大陆,船员最盼望家人的消息。王再生跑船时,与家人沟通基本靠写信。“每次快上船了,我们都提前准备好一打邮票和信封。船只要一靠港,老王就赶紧找最近的邮局把信寄了。差不多每半个月能收到一封信,家里人要反复看好几遍。”唐阿婆说。家人想写信给船员可就难了,要先打听好船舶中途停靠港口的日期,提前把信寄出去。但这往往看运气,有时船开走了,信才到港。船员经常绕了半个地球回到家,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如今的照片则告别了这类烦恼。

“平乡城”轮首航后的第二年4月18日,“柳林海”轮首航,航线为上海至美国西雅图。王再生不在这条船上,但他深知中国航运又迎来一个历史性瞬间。“柳林海”轮靠港后,美国港口第一次出现挂有五星红旗的商船,在当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大门迅速打开的一个象征。2008年,中国首制万箱船“中远亚洲”轮,全长349米,型宽45.6米。此后10年间,超大型集装箱轮加速入列。几乎每一天,都有满载“中国制造”商品的船舶从中国港口出发,又装载着世界各地的货物来到中国。(摘自《人民日报·海报》白天亮/文)



识之士的回应。据《时报》报道,当时上海的父母教育研究会认为陈嘉庚的提议“关系重大,儿童之服装反应应如何规定,尤属不可忽视”。该会教委陈征帆谓“陈嘉庚氏此项之建议,影响于民族前途甚巨”。不少人逐渐形成共识:“长袍马褂,既属逊清遗制,为旧时代之象征。而考核实际,则浪费衣料,呆板简陋……影响于人之精神萎靡松懈,而缺少奋发与勇武之气概。”“如吾人仍放任一般父母以长袍裹束其儿童,使之不便于游戏与活动,则何异坐视儿童生命之惨遭摧残。”

1938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身在新加坡的陈嘉庚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向大会发出电报,“提出三个提案:(一)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二)大中学校抗战期间禁放暑假;(三)长衣马褂限期废除,以振我民族英雄武精神”。其中,第一个案体的内容,后修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11字。

“长衣马褂限期废除,以振我民族英雄武精神”的提案和众多有识之士的呼声,对当时的服饰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渐渐地,穿长袍马褂的人越来越少,这一前清文化符号最终隐退到历史舞台背后。(摘自《生活晨报》)

1天1元 抢先体验 40mg 辅酶 Q10

安心,吃得放心,吃出健康的同时,我们还要您吃得顺心。1天1粒,同您一心一意做个“好心人”。

活动时间仅限7天,还望广大读者朋友抓紧时间报名申领,领完即止,每人可领一年量,每个家庭最多可领两年用量。

1元/天

市场价:298元/瓶(60粒)  
☑每粒含40毫克辅酶Q10  
☑补充心脏营养,更省钱  
☑一天一粒,吸收好

国食健字G20150480  
鲁食健广审(文)第2017120498号  
注意事项: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咨询热线

400-839-6665  
400-602-0212

●送货上门 ●货到付款  
●品质保证 ●30天退换保障

广告



查济古村

当中国又一波城市移民大潮开始的时候,一大群“老外”却逆势而来,向着中国的乡村地带挺进。他们去到乡村山野的最深处,醉心于简单闲适的田园生活,甚至扎根在那片土地,成为具有“洋范儿”的农民。

喝喝茶,生活就很美了

查济古村是安徽泾县最大的古村落之一。法国人于连已在这里隐居了十多年。从外面看,于连的家是一座典型的徽派建筑,但于连夫妇和他两个孩子的房间,布置却是中法“混血”的:书架、壁炉、会客区、西式厨房呈现着浓厚的欧式风格,而古旧的阁楼则被当做一家人的起居室。

“坐在院子里,看着远处环绕的群山,喝喝茶,生活就很美了。”

## 农学院“复兴”背后

2018年8月31日,中山大学宣布正式成立农学院。包括中大在内,2018年全国已经有6所高校相继成立农学院。

什么是农学

在这一波成立农学院的热潮中,北京大学的动作最早,酝酿时间最久。早在2013年8月,邓兴旺等人就向北京大学递交了成立现代农学院的申请报告。邓兴旺是美国科学院院士,曾任耶鲁大学终身教授,主要从事植物生物学基础研究。2014年7月,他正式回到北大工作。

身为湖南农民的儿子,邓兴旺体验了中国和美国的农村与城市生活。四种环境的对比,让他觉得国内农业的发展,离当今世界的先进水平差距还很大。他希望中国的农业能够实现现代化,更好的办法或许是在国内顶尖大学成立农学院培养人才。

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的现代农业科学学院于今年1月正式成立。相较于其他高等院校,国科大有自己的特殊之处——中科院下设的分布全国的104个研究所向其提供教学科研与实践的支持,其中有20多个研究机构的研究内容与农业有关。在国科大成立后,这些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生命科学学院下,项目十分拥挤,成立农学院正好可以整合现有资源。

几位高校受访者都提到,发展农学院有普遍的政策背景,即政府对农业越来越重视。

“双一流”之争

杨杰才认为,最近多个大学农学院成立,农业转型期的强需求只是其背后的动因之一,更为关键的,还是“指挥棒”效应,即农学院要争取建设“双一流”学科。只有建设“双一流”,才能获得经费与资源,这会影响到未来高考生源,对

## 中国村庄里的“洋隐士”

摇晃着手里的紫砂茶杯,于连聊起了和这个村子的渊源。

于连的家乡在法国南部的蒙彼利埃,22岁大学毕业那一年,为了免服一年兵役,于连选择了加入“海外志愿者”项目来到中国。1998年,于连在南京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曾经调查过乌镇、周庄等古镇。通过这些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对中国的古建筑和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0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于连被一个朋友带到泾县查济,立即就被这个村庄吸引。村里不仅有流水和古老的建筑,还有做毛笔和宣纸的民间艺术家,于连立即产生了要在这里艺术家的想法。

“洋派陶渊明”的隐士生活

村庄就像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像于连这样的家庭在中国并不是先例。那些“洋派陶渊明”不远万里抵达中国,过上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士生活。

在江西庐山北山公路入口处

的威家镇威家村,住着德国人寇浩

学校的生存和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些比较大众化的专业,如计算机、物理、化学等,由于竞争院校多,有的还需要很大投入,想达到“双一流”难度很大。而农学下面一级学科多,其中一些学科目前在国内发展得并不好,这就意味着还有发展的潜力和空间。

郑州大学农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成立农学院的想法始于去年下半年,当时郑大人选了“双一流”大学。正准备形成以六个学科为代表的综合性大学一流学科建设布局,而绿色高效农业学科正是其中之一。

河海大学农业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陈毓陵介绍说,河海大学农业工程学科跟“双一流”密切相关,依托“双一流”,有助于把农业工程做大做强。

应避免重复建设

北京大学曾经也有农学院。1949年,北大农学院、清华农学院和华北大学农学院各自学校分离出来再合并,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1952年,全国进行了“院系调整”之后,国内的高等农林院校全部变成独立设置的专科学院校,基本上是每个省份至少一所,各行政大区再设立一所,综合性大学中不再设置农学科与相关专业。

在1999年高校扩招以后,传统的农林学院纷纷改名走上了“综合性”或“多学科”的路子,还有一部分高校通过改名转型,彻底脱离了农林学院的行列。

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李奇教授认为,综合性高校成立农学院,这可能是一个好的发展趋势。但他认为,如果太多学校都成立农学院,会造成资源重复,所以需要地方政府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有序发展,而不是一哄而上。(摘自《中国新闻周刊》第36期 杨智杰/文)

若一家。

2004年9月下旬,寇浩若第一次到庐山旅游,就被这里的美景吸引,萌发了定居的念头。于是,在庐山住了半个月之后,他开始到山下找房子,最终选中了庐山脚下一家工厂废弃的宿舍安家,每月租金120元。

在这里,夫妇俩自己开垦了几块荒地,种上了萝卜、白菜、香菜、大蒜、生菜。为了在冬天储藏蔬菜,寇浩若在山里就地取材,动手修建了一个土温室。

当被问到为什么放弃德国的生活,而选择做中国深山的农民?寇浩若的回答很简单:“我可不是学陶渊明,他当官不如意才种地,我是喜欢中国的大自然!”

老外人驻中国乡村正在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位于怀柔慕田峪长城脚下的“国际文化村”,也被称为“老外村”,就是一处由美国人全程设计 and 打造的中国式乡村社区。

60多岁的萨阳十多年前携华裔夫人唐亮来华后,在北京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2005年,萨阳夫妇来到慕田峪长城旅游,偶然发现慕田峪村距长城大门仅有1分钟车程,并且村里年轻人外出打工,不少民居空闲着。第二年,他们就在慕田峪村租下村口废弃的村小学院落,开起了“小园”餐厅。

荣毅仁对1949年5月25日这个战火纷飞的晚上怀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那一晚,荣毅仁通宵未眠,孤身一人待在上海康平路的住宅内,夫人杨鉴清和四个孩子都去了香港,家里空荡荡的,寂寥无比。他衣冠整齐地待在书房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重要客人的光临。他感到有些兴奋,也有点紧张,甚至稍稍有些惴惴不安。他清楚,这个晚上,上海的历史正在发生剧变。

这个圣约翰大学历史学学士,有自己对历史和投资的双重敏锐和洞察力,并毕生受惠于此。但他并非没有精神压力,因为像他这样的大资本家,留下来的毕竟不多。而这也不是身位微末之事的變化,而是一场狂飙。他艰难地作出了留下来的选择,这是他深思熟虑和审时度势的结果。

璀璨的霓虹灯已熄灭,万家电火只剩下寥寥晨星的几盏。黄浦江的外国军舰和商船已撤退到吴淞口,

江面显得空旷和萧瑟。像荣毅仁一样,大多数上海人都在等待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不会有比国民党政府更坏执政者了。”

荣毅仁同意父亲的判断,父亲断事一向稳重、透彻,举重若轻,对大格局和大方向的事拿捏得住。他和伯父荣宗敬对国民党独裁统治

随后几年里,这里吸引了12个国家30多位“老外”来此居住。

**这里是全世界最有趣的地方**

老外们为什么对那些看似落后,而且与繁华生活隔绝的乡村有着如此深厚的热爱呢?

一方面,大多数乡村淳朴的人文和天然的生态,在老外眼中是一块自由地;另一方面,将隐居地选择在大地博物、历史悠久的中国,是许多老外心中向往的一场文化苦旅。这样的隐居比起过分空旷的西方农村来说,不仅休闲养生,而且还蕴含一种苦行僧式的深度体验。

此外,隐居在中国还可以保证外国人的生活质量。普遍来讲,老外在对中国国内消费远比国人在国外消费轻松。其次,几乎在国内的各大城市,都有可供老外居住的环境范本,他们除了可以轻松传统的中国文化,也可以很轻松地在中国复制自己在国外的生活。

德国作家柯立思在写《独自在13亿人中:一次横跨中国的旅行》之初,只是一次简单地:“我想和赢家在一起。”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未来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从2007年开始,他沿着中国的318国道一路西行,当旅行结束的时候,他改变了原来的想法,他说:“我要留在这里,这里是全世界最有趣的地方”。(摘自《环球人文地理》钟雯/文)

的危害有切肤之痛。所以,这一判断不仅仅是一句气话,一句诅咒,一句牢骚,而是荣家这些年所经历的惨痛遭遇的血泪体验和心头留下的肉红疤痕阵阵作痛的呼喊。

他的家乡无锡已在一个月前解放了,几乎没有打上什么像样的仗,国民党的城防军就溃不成军了。在这之前,荣家在去留问题上争执不下,父亲荣德生铁了心要留下来。他的几个儿子、侄子走了,荣氏家族多年的合作伙伴、执掌福新面粉系统的王禹卿走了。老人们在:

“卿生在你们身上,你们要赶走,我拦不住。反正我不走。”

在无锡解放前几天,有谣言说,申新的荣老板荣德生逃到香港去了,荣德生听说后,断然乘上黄包车在无锡城兜了一大圈,在车上,年过70的荣老先生笑眯眯地和遇见的熟人打招呼,后面跟着几个无锡商界的头面人物。谣言不攻自破。

荣毅仁知道后,对夫人杨鉴清说,要是在无锡,也会跟着父亲出去兜圈子的,这叫父唱子随。那个时候,荣毅仁就决定留下来了。他和父亲一样,不顾许多人的劝阻作出了留下来的决断。

解放军接管无锡后,父亲安然无恙,受到了礼遇。无锡工厂和商铺从解放之日起从未停工停业,市面繁荣,人心稳定,原来笼罩在工商业人士心头的愁云惨雾一扫而光。



《荣毅仁的前半生》高仲泰/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荣毅仁同意父亲的判断,父亲断事一向稳重、透彻,举重若轻,对大格局和大方向的事拿捏得住。他和伯父荣宗敬对国民党独裁统治

的无助,受到了礼遇。无锡工厂和商铺从解放之日起从未停工停业,市面繁荣,人心稳定,原来笼罩在工商业人士心头的愁云惨雾一扫而光。